

算法驯化视域下数字囤积的主体性 实践与权力协商

燕道成 彭天媛

摘要:数字时代,数字囤积已从个体行为演变为一种典型的媒介实践,但既有研究多囿于“病理化叙事”或“技术决定论”的二元框架,未能充分揭示其背后的复杂机制。采用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化访谈相结合的质性方法,以小红书、抖音和哔哩哔哩为数字田野,可聚焦用户数字囤积行为的实践逻辑与意义建构。研究发现,数字囤积并非被动的存储行为,而是用户在算法环境中积极建构主体性的传播实践,具体呈现为工具性、情感性与象征性三个维度;同时,该行为也是“用户—算法—平台”之间动态的权力协商过程。然而,用户的主体性表达常伴随权力的隐性让渡,抵抗行为亦难以摆脱技术资本的收编,陷入“赋权与让渡”“抵抗与收编”的双重困境。其背后是算法权力通过数据商品化与规则霸权实现的隐性再生产。基于此,构建“三维互动+双循环博弈”的辩证驯化模型,提出构建兼具传播赋能与治理适配的双重框架,以期理解数字时代“人—技术—资本”的复杂关系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数字囤积;算法驯化;主体性实践;权力协商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6)03-0029-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4AXW011)

一、问题提出

当“收藏夹里躺着三年前的干货文章”“云盘内存常年告急却舍不得删除一张旧照片”成为数字时代的常态,数字囤积早已超越个体行为的范畴,演变为时代性的媒介实践。伴随人工智能大模型的高速发展,全球数据量正以指数级态势增长。数据洪流不仅重塑存储产业的增长逻辑,更将个体裹挟进被动存储与主动囤积的双重困境。一方面,AI大模型对训练数据的海量需求,推动平台通过一键收藏、无限云存储等功能降低数据获取门槛,变相鼓励用户留存内容;另一方面,个体面对爆炸式增长的信息,既担忧错过有用资源,又难以割舍承载情感与身份的数字记忆,最终陷入“囤积—闲置—再囤积”的循环之中。克劳福德提出,以AI为核心的数字技术体系本质是“具身的、物质的巨机器”,其运行依赖对地球资源与用户数据的双重提取^{[1]42},而数字囤积恰是个体在这一提取体系中的必然回应。考研学生为真题解析创建“按题型分类”的私有收藏夹,Z世代在公开收藏夹中按“环保/女性主义”等标签重组内容。这些行为是否揭示一个被遮蔽的核心命题:数字囤积并非单纯由平台规训或心理焦虑主导的被动行为,而是用户主动驯化算法、建构意义网络、行使信息选择权的主体性实践?

本研究为理解AI大模型时代“人—技术—物质”的关系提供关键切口,存储已不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涉及物质消耗、权力分配与记忆伦理的复杂议题。研究试图回应舍恩伯格提出的当数据存储成本趋近于零、遗忘能力逐渐瓦解时,个体如何在永恒记忆与理性舍弃间找到平衡^{[2]87}?对个

体而言,数据爆炸所催生出“收藏即拥有”的认知错觉,正在逐渐侵蚀个体信息处理的能力。大量点赞收藏的干货内容占据认知资源与存储空间,它们是否真正被使用?个体是否已沦为数据的搬运工而非使用者?本研究旨在揭示数字囤积并不是一种必要纠正的问题行为,而是数字时代个体与技术、资本、环境展开权力协商的核心场域。本研究通过解码微观实践,打破“数字囤积=问题行为”这种单一叙事模式,突破先前研究的二元框架困境。同时尝试剖析数字时代的实践矛盾困境:用户看似借助数字囤积实现主体性表达,但却陷入“主动驯化就等于权力让渡”的悖论中,需揭示该悖论背后的算法权力再生产逻辑。依托上述背景与既有研究局限,本研究聚焦于三大核心问题:第一,数字囤积作为用户的主体性实践,它具体的呈现形态与内在逻辑是什么?用户通过哪些传播活动来建构主体性?第二,从算法驯化角度来看,数字囤积中的“用户—算法—平台”权力协商机制怎样运作?用户的主动驯化实践与平台的反向驯化策略之间存在怎样的动态博弈?第三,数字囤积行为中“赋权与让渡”“抵抗与收编”双重困境的形成逻辑是什么?

二、文献综述

(一) 驯化理论相关研究

“驯化理论”由罗杰·西尔弗斯通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最初聚焦于家庭场景中电视、固定电话等实体媒介的接纳过程。核心逻辑是技术适应生活世界,强调用户通过意义赋予与实践改造,使技术从公共商品转化为私人生活元素,打破了技术决定论的局限^{[3]122}。21世纪以来,随着数字媒介普及,驯化理论经历移植、扎根和生长阶段,在中国语境中,贾牧笛认为其完成从西方经验到本土场景的适配,研究场景从家庭拓展至更广阔的日常生活,分析维度从技术接纳深化至社会意义建构^[4];在2010年后,智能技术的崛起推动理论向双向驯化升级,算法时代的驯化不再是单向的人主导技术,而是“用户驯化技术”与“技术反塑用户”的辩证互动,形成动态平衡的闭环,突破了传统理论的主客二元对立^[5]。

相较于传统驯化理论,算法时代的驯化理论呈现出四个方面的新内涵:驯化对象从实体媒介转向算法、AI等无形技术系统,驯化不再依赖空间定位等显性实践,而是通过指令优化、数据输入等隐性行为实现^[6];驯化关系从主体掌握转向人机协同互构,用户通过转赞评、标签设置等行为训练算法,算法则通过个性化推荐反向引导用户行为,达到人机共生状态;驯化维度从工具实用延伸至情感与身份建构,用户通过情感投射将AI塑造为情感陪伴者^[7],导游通过驯化抖音构建文旅传播者身份^[8];驯化场景从私人领域转向公私交织,私人驯化实践与公共领域深度关联,使理论超越微观家庭研究边界。

本研究将算法驯化定义为用户与算法、平台之间动态的权力互动过程,具体包括用户主动驯化与平台反向驯化两个维度,前者指用户为满足自身需求,通过工具性、抵抗性、共谋性实践与算法协商;后者指平台通过数据商品化、资源限制、规则霸权等隐性策略,将用户驯化实践导向资本增值目标,二者形成非对称的辩证关系。

(二) 用户主体性相关研究

人类对主体性的思考始终贯穿于哲学发展的脉络,从对“人如何认知自我与世界”的追问,到对“人在实践中如何确证自身价值”的探索。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将主体性锚定于自我意识,通过对思维活动的反思确立了“我”作为认知主体的核心地位,却留下了身心二元的难题^{[9]40};康德进一步提出“先验主体”,认为主体性体现为人类以先天认知形式构建经验的能力^{[10]102};黑格尔则将主体性置于辩证运动中,主张其在“自我设定—对象化—自我扬弃”的过程中实现统一,却因“思考‘纯粹的意识’”而陷入抽象思辨^{[11]166};马克思最终将主体性拉回了现实土壤,指出其根植于劳动实践,表现为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动性、突破束缚的自主性,使思考、行动与责任在具体的社会历史中实现统一^{[12]171}。Papacharissi进一步为主体性实践提供了支持,帮助我们理解用户在塑造和决定技术系统

中所起的作用,作为一个主体,意味着人们可以对他们的心理过程和身体行为施加有意的影响,以实现他们所期望的结果^{[13]97}。这种“有意向的主动干预”视角,恰好衔接了哲学层面的主体性思辨与数字时代的技术实践,为解读用户与算法、平台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关键理论桥梁。

在数字时代的复杂语境中,用户主体性的研究呈现出复杂多元的视角。包圆圆强调在多元观点的交锋中,主体性呈现动态演化特征^[14]。平台技术与资本逻辑的交织,使用户主体性面临多重异化危机。胡智锋等人提出,资本的逐利本性与技术的操控性对用户主体性构成威胁,出现了虚假新闻泛滥、用户时间被不合理占用等问题^[15]。周怡帆在对抖音用户的剖析中提出,用户逐渐成为平台的数字劳工,出现时间异化、消费异化、情感异化、信息异化的情况^[16]。尽管算法存在技术霸权倾向,用户仍可以通过主动了解算法规则、灵活调整使用习惯等方式,积极维系自身的主体性。晏齐宏提出通过算法感知可以洞察用户主体性,青年利用算法来达到追求效率、实用、商业变现等目的^[17]。

(三) 数字囤积行为研究

“囤积”的核心语义指向对物品的长期保留与累积,且常伴随“不愿丢弃”的特征。心理学与精神病学最早将囤积纳入异常行为研究,Frost等提出了强迫性囤积的行为认知模型,认为囤积是认知偏差与情绪障碍的产物^[18]。经济学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解读,认为囤积是跨期选择的结果^[19],但过度囤积会导致资源错配。

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囤积行为转向虚拟领域,形成“数字囤积”这一新兴研究对象,其概念演进呈现对物理囤积的继承与发展。“多平台备份”行为因其可复制性而得到加强^[20],意义流动性使得数字内容的意义能够不断被重新建构。当下,数字囤积研究在延续多学科传统的同时,还聚焦数字技术带来的新议题,关于其形成原因的研究表现出多维度交织的复杂图景。朱丽丽等认为,青年群体在社交平台中所囤积的数字内容关乎有用的自我优化实践和有趣的数字体验活动^[21]。谭春辉等发现数字囤积行为是UGC信息特征,平台功能设置,用户个体习惯以及社会环境等多方共同作用的结果^[22]。贺艳等进一步细化动力结构,并重视错失恐惧等因素的推理作用,有用性评价等因素的交互作用,这些共同构成了数字囤积行为复杂的形成原因^[23]。针对西方社交平台的研究,Vinoin等构建起社交媒体囤积行为的双因素模型,该模型表明丢弃困难和贪婪特质在Instagram等平台上显著地影响用户的囤积倾向^[24]。在YouTube平台上,虽然专门的研究较少,但社区与系统综述均显示,推荐系统和视频信息流特征致使很多“稍后再看”播放列表长时间堆积,从而形成一种由算法驱动的信息囤积形态。

从物理囤积到数字囤积,相关研究一方面延续对“保留行为”的关注,另一方面又由于技术特性而开拓出新领域,但现有研究并未充分探讨“用户能动性与技术规训的动态平衡”的情况,并且对于不同文化语境下存在的差异也未深入剖析。鉴于此,本研究通过解码微观实践,尝试揭示算法社会中个体和技术互动的深层逻辑,为理解数字时代个体如何自主建构信息秩序、争夺传播主动权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应用参考。

三、研究方法 with 资料收集

研究采用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主要将小红书、抖音、网易云音乐和哔哩哔哩App作为数字田野进行考察。聚焦用户数字囤积行为的实践逻辑与意义建构。研究过程分为两个阶段,通过沉浸式观察与深度对话,系统捕捉数字囤积行为的表现形态与驱动机制。第一阶段:研究者首先以“资深用户”的身份持续使用小红书、抖音和哔哩哔哩平台6个月,积累对数字囤积行为的感性经验,包括了解收藏功能的使用场景、平台设计对行为的潜在影响等。随后创建新账号模拟“普通用户”视角,追踪不同平台算法推荐对数字囤积行为的关联,并加入相关话题群组“收藏夹清理指南”“囤货党”话题讨论,观察用户间关于囤积内容管理、删除焦虑的经验分享与互动话语。第二阶段:在观察的基础上,为捕捉数字囤积行为的多样性,本研究通过目的抽样选取25名

18~31岁访谈对象,覆盖不同职业、平台使用习惯与囤积规模,其核心特征如表1所示。通过线上访谈与平台观察,收集数字囤积的具体实践素材,用于佐证理论分析中的权力互动机制。

半结构化访谈主要围绕:数字囤积的内容类型、囤积数量、囤积行为的原因、对囤积行为的认知与评价、阻碍删除行为的关键因素以及在不同平台中数字囤积行为的差异等内容。访谈通过线上视频的形式进行,同时补充收集平台公开资料作为辅助素材,包括小红书、抖音的用户协议中关于收藏功能的条款、相关功能迭代说明等。这些访谈案例与公开资料均来自主流社交平台,涵盖学生、白领、自由职业者等多元群体,其数字囤积行为具有一定实践代表性,可为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提供具象化的现实参照。

表1 数字囤积行为访谈对象核心特征表

编号	性别	年龄	职业	使用平台	原因	具体数据	囤积内容处理方式
W1	女	24	情感疗愈师	小红书	个人兴趣	点赞+收藏 9755	从不删除
W2	女	23	硕士生	多个平台	有趣+顺眼	收藏 2872	内存不够会删除
W3	女	18	高中生	小红书	感觉会用到	收藏 1881	从不删除
W4	女	19	本科生	哔哩哔哩	个人兴趣	收藏 8092	很少删除
W5	女	24	待业	小红书、抖音	有用、学习功能	收藏 2895	从不删除且偶尔回看
M6	男	25	公务员	小红书、抖音	有用、有趣	点赞 2880	很少删除
W7	女	23	硕士生	小红书	有用、喜欢	收藏 2220	从不删除
W8	女	21	本科生	小红书	有趣	收藏+点赞 1835	从不删除且偶尔看
M9	男	24	硕士生	多个平台	给朋友点赞	收藏 1686	从不删除
W10	女	22	待业	哔哩哔哩	以后用的到	收藏 2082	从不删除
W11	女	20	本科生	小红书	备考需求+兴趣	收藏 2356	偶尔删除
M12	男	26	程序员	哔哩哔哩	技术学习+资源备份	收藏 1894	从不删除
W13	女	25	新媒体编辑	小红书、抖音	有用的行业案例	收藏+点赞 2579	偶尔删除过时资讯
W14	女	29	全职妈妈	抖音	有趣、有用	收藏 5493	从不删除
M15	男	30	自由摄影师	小红书	美学参考+客户约拍	收藏 1462	偶尔删除
W16	女	29	插画师	网易云、小红书	情绪调节、有用	收藏+点赞 3178	从不删除
M17	男	21	本科生	哔哩哔哩、抖音	游戏攻略	收藏 1247	从不删除
W18	女	19	高职学生	网易云	音乐收藏	收藏 1080	从不删除
W19	女	31	心理咨询师	抖音	有用、有趣	收藏+点赞 2647	偶尔删除且回看
W20	女	28	博士生	小红书、抖音	有趣	收藏+点赞 1124	定期删除
W21	女	23	待业	小红书、抖音	有用、有趣	点赞 3288	偶尔删除
M22	男	29	电商主播	抖音	热点、攻略、测评	收藏+点赞 7968	从不删除
M23	男	30	中学教师	哔哩哔哩、抖音	有用、学习功能	收藏+点赞 1229	定期删除
W24	女	23	硕士生	小红书、抖音	有趣、放松	收藏 3025	很少删除
M25	男	18	本科生	抖音	有趣	收藏 1349	从不删除

四、数字囤积主体性实践的传播学三维度

数字囤积并不是单纯的内容留存行为,而是算法环境中用户主体性的一种具象化表达。结合参

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本研究将其从工具性、情感性与象征性三维度进行分析。既呼应马克思实践论与班杜拉能动性理论对主体性的核心阐释,也契合数字囤积行为的多元实践逻辑。研究将结合具体访谈案例,系统解析各维度的实践形态与内在逻辑。

(一) 工具性实践:信息管理的传播权争夺

“战略”是权力主体通过建构稳定框架,如规则、空间、制度来掌控资源的逻辑,而战术是弱势主体,如个体、用户在战略框架内,通过灵活、临时的实践突破规训的行动方式^{[25]97}。在数字平台语境中,“战略”的载体已转变为算法建构的“信息流框架”。“休息的时候打开短视频平台,刷到什么看什么,平台推什么我看什么,除非特别枯燥的,主打不动脑子只图一乐。”(M25)平台通过技术规则“隐性塑造用户的信息接触路径,将自身利益嵌入看似中立的算法逻辑”^{[26]182}——具体表现为“热门标签分类”“个性化推荐算法”等设计,本质是用技术权威垄断信息筛选与呈现的权力。

用户的“战术实践”也从传统的“临时应对”升级为“稳定化的私人系统建构”。这一转变契合 Napoli 对用户媒介实践自主性的观察:当平台算法过度规训信息获取路径时,个体倾向于通过建构独立于平台的信息管理体系重获主动权^{[27]77}。“我点赞的除了美妆穿搭,还有求职简历类型的,有时候不想看就放在分组里,有的好久了也没看过。”(W10)具体到数字囤积行为中,用户不再是偶尔对抗算法,而是主动搭建专属的“信息管理体系”,通过对数字内容的分类、储存,重新定义信息的价值标准与调用规则。这种从临时战术到系统战术的跃迁,正是数字时代工具性实践的核心特征,也是用户争夺信息管理传播权的关键路径。“小红书给我推的插画教程总混着好多热门流量内容,有时候很久之前点赞的东西用的时候就找不到了。后来我自己建了#商稿配色#肌理质感的标签,很快就能搜到了。”(W16)面对平台算法用“热门推荐”预设的信息路径,用户通过搭建私有化标签体系,重新掌控了信息管理的主动权,将算法主导的流量逻辑信息流转化为适配自身需求的创作逻辑素材库,本质是对信息管理传播权的直接争夺。

(二) 情感性实践:数字记忆的传播仪式建构

在数字时代,记忆的存储与传承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要理解数字囤积中情感性实践的深层逻辑,需先回到“数字记忆”的学术界定——它并非传统记忆的数字复制,而是数字时代个体情感、身份与社会关系的“元载体”。所谓“记忆双轨制”:一是文化记忆,依托集体仪式、经典文本等稳定载体传承;二是交往记忆,依赖个体间的日常互动存续,具有鲜明的情感性与即时性^{[28]5}。“每次很久之前的聊天记录或者点赞过的内容我都舍不得删掉,因为我觉得它们就像陪伴了我很久的物品一样,放在那里舍不得删除。”(W3)数字时代的聊天记录、旧照片等内容,恰恰是交往记忆的数字转化——它保留了交往记忆中情境化情感的核心特征,同时由于数字载体的可复制性、可存储性,突破了传统交往记忆“依赖即时互动、易随时间消亡”的局限^{[29]5}。但这种突破也带来新的矛盾:数字记忆的存续不再依赖个体记忆能力,而是依赖平台的技术规则,这不仅为平台“时效逻辑”的介入提供了空间,也让个体的情感性数字囤积成为争夺记忆主导权的传播实践。

平台算法所追求的流量至上,直接引发个体的数字记忆焦虑。“有时候看到那种解读历史的视频,我会收藏点赞,但是这种视频都很长,我不想一次性一下子看两个小时,结果越存越多,每次看到一堆点赞历史我都下不了决心把视频看完。”(W4)数字时代的即时性崇拜加速了记忆的贬值速度,个体害怕因平台规则失去与过往情感的联结^{[30]202}。此时用户的情感性数字囤积不再是单纯的数据保存,而是一种情感抵抗。通过主动掌控记忆的存储方式,个体试图打破平台预设的记忆半衰期,赋予数字记忆超越流量逻辑的“情感永恒性”。数字记忆的情感性囤积本质是个体对记忆传播权的重新掌控。数字媒介重构了记忆的生态,个体不再被动接受记忆的规训,而是主动参与记忆的塑造与传播^{[31]259}。用户通过囤积特定数字内容,构建起一套独特的数字记忆传播仪式,以此对抗平台主导的时效逻辑。

（三）象征性实践：身份展演的传播策展

数字技术打破传统媒体“专业生产—大众消费”的单向传播格局,用户不再是被动的内容接收者,而是主动的参与者、创作者与传播者^{[32]31}。他们通过二次创作、内容分享等方式,在去中心化的网络空间中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化社群与身份认同。这种参与式转向的本质,是传播权力从机构向个体部分的让渡,而身份政治的展开,也从“被动接受社会规训”转向“主动通过媒介实践定义自我”。同时,参与式文化中的身份展演并非无目的的自我暴露,而是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在数字时代的延伸。个体的身份认同与社会地位,往往通过对文化符号的选择与展演来建构^{[33]865}。在数字时代,这种文化符号的展演不再是私人化的信息存储,而是可被公开解读的文化符号集合:用户通过公开收藏夹的行为,将这些符号转化为数字文化资本,进而在参与式社群中完成身份的宣告与认同的寻求。

“有些平台的个人收藏夹我会公开,遇到一些比较有内涵或是有审美的东西我会点赞,然后有朋友问我的账号的时候我会让他们关注那个账号,另外会再有一个小号点赞一些我感兴趣但是又不想让别人看到的内容。”(M25)数字时代的身份还呈现出流动性与策略性的新特征。网络空间中的身份不再是固定的本质性存在,而是个体根据不同社群场景临时建构与展演的结果^{[34]442}。用户在参与式文化中进行的身份策展,通过筛选、分类、公开特定的数字内容,主动塑造自己在某一社群中的理想形象,进而获得社群成员的认可与接纳。这一举动也是数字时代个体主体性的重要体现,“收藏夹公开”的行为,使用户从被动接受标签转向主动定义标签。数字囤积的象征性实践,是用户在算法环境中争夺身份话语权的微观策略,它不仅揭示了数字囤积行为背后的身份政治逻辑,也为理解数字时代“人—媒介—社群”的复杂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五、数字囤积机制：算法驯化的传播权力协商

数字囤积并非用户单向的存储行为,而是“用户—算法—平台”三者动态互动的权力协商过程。传统驯化理论聚焦家庭场景中技术的被动融入,但在算法主导的数字平台中,驯化呈现出主动协商与隐性约束交织的新逻辑:用户通过工具化、抵抗性、共谋性三种实践,试图掌控算法规则以实现自身需求;而平台则通过默认设置、资源限制等隐性规则,悄然框定协商边界,最终形成“用户驯化算法—平台反向驯化用户”的权力循环。下文将从“用户主动实践—平台隐性约束—权力失衡总结”三个维度,拆解数字囤积的算法驯化机制,揭示权力协商的微观逻辑。

（一）用户主动驯化：与算法规则协商的三种实践形态

用户积极驯化算法,其本质在于,用户对算法运行逻辑有一定的认识后,通过改变自身行为以影响算法输出,从而与平台展开隐性博弈。这种博弈并不是单纯的线性递进,而是用户依照平台环境及自身需求动态切换的策略集合。数字时代的驯化已不再只是技术适应人的单向过程,而是人经由实践操作重新塑造技术意义的双向交流,其具体表现为工具性,抵抗性与共谋性三种实践。

工具性驯化是用户和算法之间的协商形式,其目的在于加强信息获取的效率,基于此,用户自觉向算法移交部分控制权,从而得到更加精准的服务。平台凭借个性化推荐算法以及标签分类体系来构建信息分发的架构,而用户则通过主动填充标签的举措,引导算法朝着自己的需求方向发展。在算法环境中,这种契合表现为用户用标签数据换取精准信息,并且主动暴露兴趣爱好,算法则给予定制化的相关内容,二者达到一种短期的权力平衡。抵抗性驯化是用户想要守护情感记忆,隐私内容等,通过脱离算法场景或限制算法权限,以此局部削减算法权力的协商方式。在算法驯化过程中,这种抵抗体现为空间隔离和权限关闭,用户会把敏感内容从算法能触及的平台收藏夹移到算法难以获取的本地存储里,或者关闭算法的数据获取功能,例如屏蔽个性化推荐。本质是通过切断算法与内容的连接,局部消解其信息掌控权。“之前换的旧手机很多都是内存占用满了,手机运行越来越慢。老手机里还有很多我没删除和整理的照片,平时我也不在社交平台上发,虽然用的是网名,其实都是透明的。”(W18)这种驯化的权力效果是局部消解,用户无法完全脱离平台,但通过核心内容本地存

储,使算法失去对私人意义的干预能力。算法难以获取本地内容的情感价值,也无法将其转化为数据资产,从而实现对算法权力的精准抵抗。共谋性驯化是用户依照算法规则来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把私人收藏变成公共身份展演工具的一种协商形式,在算法环境中,共谋性驯化把“用户经由内容分享去争夺文化生产权”与“个体借助符号展演来收获社会认可”相结合,用户凭借算法的标签推荐,流量分发规则,把公开收藏夹当作身份符号容器,利用算法的传播放大效应,做到意义生产权的再分配——从“算法定义用户身份”转向“用户借算法定义自我”。

(二) 平台隐性约束:隐性约束下的权力再生产逻辑

用户的三层主动驯化看似掌握协商的主动权,但平台经由规则设计营造出无形的权力边界,无论是工具性驯化的标签交换,抵抗性驯化的本地存储,还是共谋性驯化的身份展演,终究需要在平台预先设定的规则框架中展开,这种约束并非显性的强制行为,而是借助数据商品化,资源限制等隐性策略,将用户的驯化活动引向平台的利益方向,本质是数字平台权力再生产的核心逻辑。

用户在工具性驯化中积极喂养的标签数据,经由平台变为商品化资产,打破了效率交换中的权力平衡。平台凭借“标签数据—用户画像—定向广告”的策略,当用户给收藏夹打上诸如“考研干货”之类的标签时,平台不仅借此改善推荐功能,而且利用标签信息进一步完善用户画像。“在我建立了#考研真题的收藏夹以后,每次刷小红书刷到的都是考研机构的广告,甚至有机构开始私信问我报不报班。”(W21)这种约束本质上属于权力不对称的效率交换,用户用标签数据换取短期效率,平台则用数据换取长期资本增值。用户的主动让渡被异化成免费数字劳动,工具性驯化的平衡关系渐渐偏向平台一方,用户经由本地存储,关闭推荐来抵抗驯化,看似切断算法与私人内容的连接,实则掉入平台以“存储资源限制”为核心的情感控制陷阱,这种约束实质上是平台将数字记忆的情感价值当作付费服务定价的依照,并非仅仅出于技术功能上的限制,平台的核心策略是“稀缺性建构+情感定价”的双重设计,一方面通过极低的免费存储空间制造资源焦虑。iCloud 初始空间仅 5GB、百度网盘免费用户单文件下载限速至 100~300KB/s,这种刻意不足的设置并非技术局限,而是平台的稀缺性营销。平台通过压缩免费资源边界,让用户意识到不付费即失去。另一方面,将存储需求与情感价值深度绑定。平台精准识别“聊天记录”“纪念照片”等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内容,利用用户不愿删除情感载体的心理,将付费扩容包装为记忆守护方案,而非单纯的功能购买。“我平时从来不整理那些文件和照片,内存不够就买个会员升级一下呗,反正不会对我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找文件的话我一般按照时间顺序或者搜索框来查找,不会直接在桌面上找,因为文件实在太多了。”(W2)数字平台的规则设计不是一个中立的技术框架,而是承载符号资本逻辑与公共价值观的意识形态筛选机制,这种筛选在共谋性驯化的约束中表现为对展演内容与展演方向得双重控制。用户借算法展开的身份展演,本质是试图在平台规则内争夺意义生产权,但平台通过默认设置与流量规则的双重干预,将自主身份表达篡改为主流意识形态与平台利益的标准化表演。

(三) 机制总结:协商背后的权力失衡与反向驯化

数字囤积的算法驯化机制并非“用户驯化算法”的单向过程,而是“用户主动实践—平台隐性约束—权力失衡”的动态循环,最终形成“反向驯化”的闭环。用户看似掌握协商主动权,实则被平台纳入资本增值框架。

用户的三层驯化实践均呈现“短期协商平衡—长期权力从属”的演变轨迹,数字平台通过低门槛的实践入口让用户产生掌控算法的错觉,但背后早已用规则划定了协商边界。“我觉得没必要总说算法对我们产生了什么负面影响,我平时用到的存储空间,点赞收藏的内容,都没有给我的现实生活造成什么影响。”(M17)用户每一次主动协商,都是在平台预设的框架内进行,权力关系从看似平等的协商逐渐滑向平台主导的从属。本研究拆解的机制突破了传统驯化理论“技术—用户”的二元框架,揭示了算法驯化的非对称性内核,用户与平台存在主体非对称、目标非对称、结果非对称。这种非对称性表面,数字囤积中的算法驯化绝非“技术为人服务”的理想形态,而是技术与资本合谋的权

力规训过程:用户的每一次主动实践,都是在为平台的权力扩张与资本增值添砖加瓦。

数字囤积工具性、情感性与象征性的主体性实践,并非脱离技术语境的抽象表达,而是算法驯化过程的核心起点与实践内容。用户通过标签分类、情感备份、收藏策展所展开的主体性建构,本质是对算法的正向驯化尝试;而这种主体性的实现程度与形态演变,又始终受限于平台通过数据商品化、资源限制所实施的反向驯化。二者构成“主体性为内核、驯化为载体”的辩证互动,共同塑造了数字囤积中主动建构—被动约束的权力博弈图景。

六、批判性讨论:数字囤积中算法驯化的悖论与传播政治

用户看似通过工具性、情感性、象征性实践实现主体性表达,但却仍陷入驯化即收编的困境。算法权力如何通过数字囤积完成隐性再生产?既有驯化理论又该如何回应这种非对称互动?这里将从“主体性神话解构”“传播政治逻辑深挖”与“理论重构与路径探索”三个维度展开批判性讨论,直面数字囤积中算法驯化的核心悖论,揭示其背后的传播政治张力。

(一)主体性神话的解构:数字囤积中的传播政治困境

在上一章节中所揭示的用户工具性打标签、情感性备份记忆、象征性收藏夹策展等主体性实践,常被解读为算法时代个体赋权的典型表现,但当我们透过主动驯化的表象,会发现这些实践实则嵌套于传播政治的深层困境中——用户的主体性表达始终伴随着权力让渡,抵抗行为也难逃技术资本的收编,所谓自主掌控算法,更像是一种需要被解构的主体性神话。

1. 赋权与让渡的双重性:主体性实践沦为“免费数字劳动力”

数字囤积中用户的工具性驯化实践,常被表面解读为算法赋权的典型形态:用户通过主动打标签、分类收藏,看似获得了信息管理的自主权,实现了算法为我所用的需求。但当我们引入数字劳动的理论框架来审视这一过程,发现这种赋权始终伴随着不可逆转的权力让渡。用户的主体性实践最终异化为平台资本积累的免费数字劳动力生产过程,形成赋权即剥削的深层悖论。Smythe 在受众商品论中提出,大众媒介时代的受众花费时间接触媒介内容的行为,本质是在为媒介生产可售卖给广告商的注意力商品^[35]。而在算法主导的数字时代,这一逻辑被升级为用户数据商品论:用户的每一次主动数字实践,都在生产比注意力更具价值的数据商品。数字平台的核心盈利模式是将用户的日常数字实践转化为可商品化的数据,再通过数据交易与广告变现完成资本增值,而用户却因数据生产的无感知性,将这种剥削误判为技术赋权^{[36]108}。

这种赋权与让渡的双重性,在数字囤积的工具性驯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用户为了提升信息获取效率,主动为收藏内容打上“考研真题”“商稿配色”“职场效率技巧”等标签,这一行为看似是优化算法推荐的自主选择,实则是在为平台生产精准用户画像的核心数据。用户的效率优化实践已不再是单纯的主体性表达,而是沦为平台无需支付薪酬的免费数字劳动力,用户为获得短期的精准推荐,付出了数据被永久剥削的长期代价。“平时课堂汇报展示,我会在小红书上找好看的PPT课件,后来我发现平台推送给我的都是好看的要付费的内容,汇报完以后还会刷到很多与PPT课件有关的帖子,我可能已经被平台认定为购买PPT的那一类用户群体了。”(W11)数字时代的技术赋权常常是由平台营造的认知幻象,其本质在于以短期的功能便利换取用户长期的数据让渡并实施劳动剥削,用户在工具性驯化进程中所追求的效率自主,终究被算法转化成资本增值的工具,而赋权与让渡的双重性,也成了数字囤积中传播政治困境的核心表征之一。

2. 抵抗的仪式性与收编的必然性:情感实践难逃技术资本体系

数字囤积中用户的抵抗性驯化实践,往往被当作对算法权力的有效突围,用户把带有情感回忆的聊天记录,成长照片转存到本地,或关闭个性化推荐功能,从而切断算法对个人意义的干预,这样做看似通过空间隔离与权限关闭守住了情感领地,但若从技术资本批判的角度出发,会发现这种抵抗本质上带有仪式性特征,它只能做到短期的情感守护,却无法突破技术资本的利益闭环,最终仍会

被平台以“情感价值商品化”的方式收编,形成抵抗即被转化为消费。它避开算法权力的数据采集、推荐干预等环节,但是并未触及技术资本“将一切情感价值转化为商品”的核心战略,而平台对用户情感实践的收编,契合 Harvey 空间修复理论在数字时代的演绎:当用户试图用私人化的本地存储来进行抵抗时,平台会迅速把情感存储需求变为新的盈利空间,利用“稀缺性存储资源+情感价值定价”的策略,再次把私人情感空间纳入资本增值的轨道^{[37]409}。

平台对情感实践的收编通过双重逻辑来展开,一方面,以稀缺性营造情感焦虑,平台有意把免费存储空间设置成“难以承载用户核心情感内容”的阈值;另一方面,以情感价值包装完成收编,把技术服务同情感的永久性关联起来,使用户的付费行为从被动妥协转化为主动的情感投资,此时用户的抵抗性实践已经被平台转化成自愿消费的理由,抵抗的意义被消解,最终变为技术资本体系下的情感消费活动。“无论照片拍得好不好,都是孩子过往成长的见证,我买了单独存放照片的U盘也开了扩大内存的会员,我希望以后这些照片都能保留下来,让她长大以后能看到小时候的样子。”(M23)平台无需通过强制手段,只要利用用户对情感记忆的珍视,就能将抵抗转化为消费,使私人情感实践最终成为技术资本体系的助燃器,这种抵抗的仪式性与收编的必然性,揭示了数字囤积行为中情感实践的深层困境:在技术资本将一切价值转化为商品的逻辑下,个体的情感守护很难成为真正的权力突围,甚至有可能成为资本增值的新途径。

(二)传播政治的深层逻辑:算法权力的隐性再生产

第五部分对“用户主动驯化—平台隐性约束”进行拆解,表现出数字囤积算法互动的表层机制,本部分通过这一互动,揭示其背后的传播政治本质:算法权力并不是凭借单次的用户让步或平台强压实现,而是依靠数据商品化与规则霸权,把权力嵌入用户的日常实践与认知习惯当中,完成无感化、持续性的隐性再生产。

1. 数据商品化:用户实践的“价值榨取”闭环

在数字囤积的行为中,呈现为三重递进的闭环逻辑:首先是数据生产的无意识性,当用户点赞收藏“技术资源”“审美积累”“考研信息”这类内容时,关注的是方便查找、以备不时之需的个体需求,却未意识到这些行为正在为平台生产可标注、可分类、可交易的数据原材料,这种无感知生产恰恰是价值转化的起点。“我平时喜欢点赞案例分析这种专业内容,初衷是为了工作时快速调取,后来平台总推给我,我才意识到这是大数据。”(W19)其次是数据加工的遮蔽性,平台并非直接将原始数据出售,而是通过算法对其进行价值提纯,通过用户点赞收藏关注的内容构建出精准的用户画像,这种加工让数据从零散信息变成高价值商品,且用户往往会陷入信息茧房中,而产生“自己掌握并控制了算法”的错觉;最后是数据流通的闭环性与残留价值的利用,平台刻画用户画像后,并未停止对数据的利用,与画像相关的内容会接连推送,通过高频率、高点赞的内容为用户创造新需求,实现数据残值的二次利用,形成“一次囤积实践,多次价值榨取”的闭环。

与工业时代的体力劳动不同,数字囤积中的劳动异化呈现出更隐蔽的特征。用户为分类信息付出的认知劳动、为整理收藏夹消耗的情感劳动,既不被视为劳动,也不被支付报酬,却通过数据商品转化为平台的利润,“我们在平台上买流量推产品,平台会把产品推给精准用户,我们后台能看到所有视频的投资回报率,专业一点就是ROI。”(M22)这种“劳动—报酬”的剥离,正是算法权力实现价值掠夺的核心手段。从商品属性的角度来看,数据商品的“非损耗性”与“无限增值性”使其超越了传统商品的流通逻辑,成为算法权力持续扩张的“永动机”。数据首先作为初级商品被平台从用户实践中提取,随后又作为生产资料参与新的商品生产^{[38]162}。在数字囤积中,这种双重性表现为用户点赞收藏后形成的用户画像,既是被出售给培训机构的初级商品,又是平台开发新服务的生产资料。当用户这一阶段的需求满足后,这些数据又凭借其关联的属性,参与新一轮的商品生产。数据在此过程中不会因使用而损耗,反而会因场景的迁移而产生新的使用价值。

2. 规则霸权:平台对意义生产权的垄断

平台通过设计规则框定用户实践,这种规则约束并非简单的平台强制,而是算法权力通过将规则自然化,让用户主动接受甚至内化这些规则,最终实现对意义生产权的隐性垄断。用户不再觉得收藏夹默认公开是平台的设计,而认为是数字空间的常识;不再觉得迎合热门标签是被迫妥协,而认为是让自己跟随主流审美融入大众。这种规则即常识的认知,正是算法权力隐性再生产的核心。

在数字囤积过程中,平台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规则,悄然实现对意义生产权的垄断。在数字平台上,平台所制定的规则构建起一种不平等的意义生产秩序,平台利用自身作为数字基础设施与信息传播枢纽的地位,将自身的利益诉求嵌入规则逻辑中,使得用户在意义生产与传播的过程中,不自觉地遵循平台设定的框架。伊尼斯提出“知识垄断”的概念,指出当统治阶级通过控制关键传播技术来维持政治权力时,知识垄断便会产生^{[39]19}。在古代埃及,复杂的书写系统赋予了有文化的牧师和抄写员知识垄断权,因为掌握读写艺术需要长期的学徒期和指导,知识因此被限制在这一特权阶级。在数字时代,平台通过算法规则、内容审核标准、推荐机制等技术手段,控制着数字信息的传播与意义的生成。库尔德利认为,媒介规则的霸权性在于它让用户相信只有遵循规则,才能实现意义的价值^{[40]72}。例如平台制定的内容审核规则,决定了哪些数字囤积的内容能够被广泛传播,哪些将被边缘化。用户为了使自己发布的内容获得更多的关注,不得不迎合平台的审核标准,从而在源头上影响了意义生产的自主性。“有时候需要在平台上发布帖子,有时候我的照片是单纯的分享日常生活,但是如果想要获得点赞和粉丝,增加我这个照片的浏览量,我就要在创作中心那里增加热门标签,比如浪漫生活的记录者。”(W1)用户的行为并非被平台强制改变,而是在“意义要被看见才有价值”的认知下,主动将平台规则内化为自我要求,最终让自己的意义生产完全围绕平台的价值标准展开。此时算法权力已无需通过约束实现,而是通过用户的自我规训完成隐性再生产。

(三)理论重构:走向辩证的算法驯化观与突围路径

无论是聚焦技术被动融入家庭的早期驯化理论,还是将“用户—算法”简化为“抵抗—收编”二元对立的批判框架,都难以适配数字囤积中用户既主动驯化算法、又被算法反向规训的复杂互动。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需要我们跳出线性逻辑,构建一种既能容纳用户主体性价值,又不回避权力非对称性的辩证视角。数字囤积的互动逻辑可通过图1清晰呈现:用户以“前驯化想象”为起点,基于工具需求、情感守护和身份表达等目的,主动介入算法运作逻辑。平台在接收用户实践数据后,通过数据商品化、意义垄断等方式发起反向驯化,将用户驯化行为导向平台运营目标。用户在感知到压力后开始反驯化实践,通过关闭个性化推荐或注销账号等手段,重新适配自身驯化策略,由此形成持续迭代的权力博弈闭环。这里将先从理论层面拆解数字囤积的互动本质,提出数字囤积的辩证驯化模型,再以此为基础探索突破权力闭环的突围路径,为理解算法时代“人—技术—资本”的关系提供新的理论坐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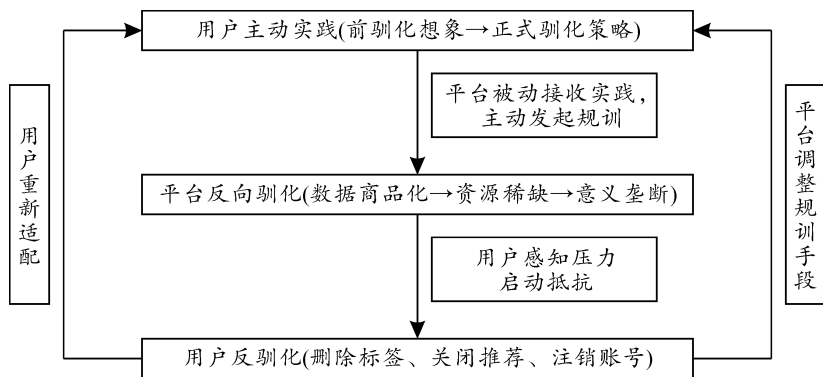


图1 数字囤积中“用户主动驯化—平台反向驯化”互动循环图

1. 理论重构:数字囤积的辩证驯化模型

传统驯化理论以罗杰·西尔弗斯通的六阶段模型为核心^{[3]184},聚焦家庭场景中技术从商品到日常生活组件的静态嵌入过程,但其难以适配算法主导的数字囤积场景中“用户主动实践与技术反向规训交织”的复杂关系。基于西尔弗斯通“预驯化—正式驯化—再驯化”理论框架^{[3]123},本研究进一步拆解用户与平台在各阶段的行为对应关系,如图2所示。在用户实践逻辑层面,用户始终以“工具需求、情感需求、身份需求”为导向,在传统驯化理论的各阶段展开策略性实践。在前驯化阶段,用户会主动将云盘、收藏夹等工具想象为情感记忆容器或身份展演载体,而非单纯的技术工具;在正式驯化阶段,通过创建私有标签、点赞收藏或下载等行为,主动规划技术的使用边界;在后驯化阶段,既会将公开收藏夹转化为身份符号,也会在反向驯化的压力下采取注销账号、关闭个性化推荐等反驯化措施。平台的规训逻辑则体现为反向驯化的层层渗透,在挪用阶段,将用户主动标注的标签数据转化为广告资产;在客体化阶段,通过低容量的免费存储、下载限速制造资源稀缺性;在转化阶段,以流量规则垄断意义生产,倒逼用户迎合热门内容。二者的互动形成“用户主动实践—平台反向驯化—用户反驯化—新的主动实践”的循环,且循环中始终存在平台主导、用户从属的权力非对称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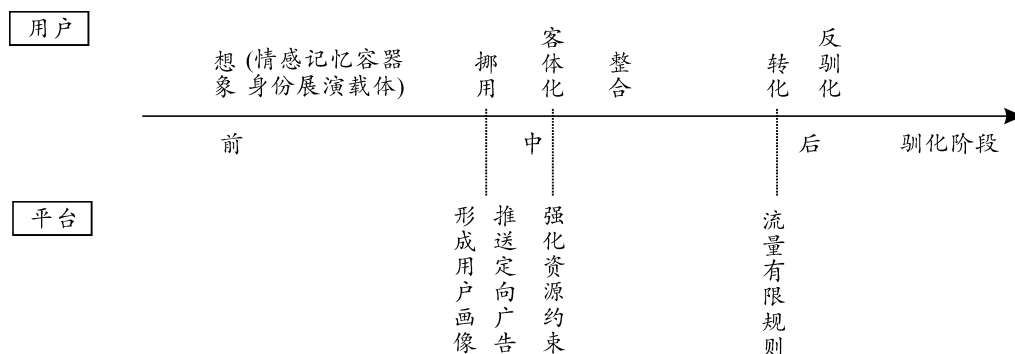


图2 用户驯化阶段与平台规训行为对应关系图

2. 突围路径:从“个体抵抗”到“制度性赋权”

在数字囤积过程中,个体反驯化是用户主体性表达的重要特征,却因碎片化、仪式化与认知局限,难以突破平台的资本与规则霸权。个体抵抗往往呈现出非协同性的特征,部分用户选择本地存储,部分选择注销账号或是开设新账号,分散的行动无法对平台规则产生实质性冲击。同时,个体抵抗易被平台收编,用户为规避广告选择本地存储,却可能因为物理属性不便携或是易损坏而被迫购买付费存储服务。为拒绝同质化推荐点击不感兴趣,又可能因推荐质量下降而重新搜索点赞收藏,最终陷入“抵抗—焦虑—消费”的困境,而算法黑箱的存在,更让用户难以掌握有效的抵抗策略,只能停留在表面操作。

破解这一困境需要构建兼具传播赋能和治理适配的双重框架,实现从个体被动抵抗到系统主动驯化的转型。在传播赋能方面,培育用户算法驯化能力的分层体系。在认知层面,将算法驯化逻辑纳入国民数字素养教育,通过短视频、图文教程等通俗传播形式,帮助用户理解如何通过行为改变来影响算法输出;在实践层面,鼓励形成算法驯化经验社群,形成群体智慧,互相分享经验;在工具赋能层面,推动第三方开发轻量化辅助工具,为用户主动驯化算法提供技术支撑。同时构建合理透明的平台治理机制,要求平台公开收藏内容的算法处理规则,破解算法黑箱导致的驯化信息不对称;赋予用户随时调整数据使用权限、删除算法训练痕迹、注销个性化推荐的权利。让数字囤积的驯化实践回归人与技术共生的本质,实现从资本逻辑到公共逻辑的转变。

参考文献:

- [1] 克劳福德. 技术之外: 社会联结中的人工智能. 丁宁, 李红澄, 方伟, 译. 北京: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2024.
- [2] 舍恩伯格. 删除: 大数据取舍之道. 袁杰,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 [3] 西尔弗斯通. 电视与日常生活. 陶庆梅,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 [4] 贾牧笛. 而立之年的命运: 驯化理论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移植、扎根与生长. 新闻界, 2023(6): 73-82.
- [5] 李锦辉, 颜晓鹏. “双向驯化”: 年轻群体在算法实践中的人机关系探究. 新闻大学, 2022(12): 15-31+121-122.
- [6] 丁方舟, 张多. “AI 只是你的工具吗?”——智能传播生态下短视频博主与 AI 的人机关系研究. 新闻大学, 2025(1): 1-14+119.
- [7] 姚建华, 张申博. “异人”之爱: 驯化理论视域下人机亲密关系的建构与演变——以智能聊天机器人 Replika 为例. 中国青年研究, 2025(6): 83-91+100.
- [8] 何文俊, 吴恒, 李晓丹, 等. 媒介驯化视角下导游“抖主”的角色演化历程. 旅游学刊, 2024(11): 124-135.
- [9] 笛卡尔. 论方法 第一哲学沉思. 张小勇,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
- [10]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 邓晓芒, 译. 杨祖陶, 校.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11]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贺麟, 王玖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12] 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卷. 郭大力, 王亚南,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 [13] NEFF G, NAGY P. Agency in the digital age: using symbiotic agency to explain human-technology interaction//PAPA-CHARISSI Z. A networked self and human augmentic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entie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 [14] 包圆圆. 本质性互动视阈下新媒体用户的主体性建构.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9(10): 156-158+163.
- [15] 胡智锋, 邵文灿. 论平台数字新闻生产中用户的主体性建构. 山东社会科学, 2023(7): 144-150.
- [16] 周怡帆. 异化与回归: 数字劳工视域下抖音用户的主体性表达. 当代电视, 2024(5): 53-58.
- [17] 晏齐宏. 青年用户算法感知中的技术意识和社会意识——基于用户主体性视角的分析. 中国青年研究, 2023(4): 61-72.
- [18] FROST R O, HARTL T L. A cognitive-behavioral model of compulsive hoarding.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1996, 34(4): 341-350.
- [19] LAIBSON D. Golden eggs and hyperbolic discount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 112(2): 443-478.
- [20] 吴旭瑶, 李静. 信息时代的“数字占有”——数字囤积及其相关研究. 心理科学, 2021(4): 800-806.
- [21] 朱丽丽, 姜红莉. 消极绩效主义实践: 基于社交平台青年群体数字囤积行为的研究. 国际新闻界, 2024(6): 154-176.
- [22] 谭春辉, 邹雅婷, 王仪雯, 等. 社交媒体用户的 UGC 数字囤积行为形成机理. 图书馆论坛, 2025(3): 130-140.
- [23] 贺艳, 林辰. 社交媒体平台研究生学术性数字囤积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SEM 和 fsQCA 的实证分析.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25(7): 16-30+63.
- [24] VINOI N, SHANKAR A, KHALIL A, et al. Holding on to your memories: factors influencing social media hoarding behaviour. Journal of retailing and consumer services, 2024, 76(c): 103617. [2025-08-17]. <https://doi.org/10.1016/j.jretconser.2023.103617>.
- [25] 塞托. 日常生活实践: 1. 实践的艺术. 方琳琳, 黄春柳,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26] 希勒. 数字资本主义. 杨立平, 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 [27] NAPOLI P M. Audience evolution: New technolog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a audienc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 [28] ASSMANN J. Cultural memory and early civilization: writing, remembrance,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29] HOSKINS A. Digital memory studies: media pasts in trans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 [30] HARVEY 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SEIDMAN S, ALEXANDER J C. The new social theory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 [31] 胡泳. 众声喧哗: 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32] 詹金斯. 融合文化: 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 杜永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33] 布尔迪厄. 区分: 判断力的社会批判: 下册. 刘晖,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 [34] 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 夏铸九, 王志弘,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 [35] SMYTHE D W.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977, 1 (3): 1-27.
- [36] FUCHS C.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 [37] HARVEY D.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38] 莫斯可. 传播政治经济学. 胡春阳, 黄红宇, 姚建华,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 [39] 伊尼斯. 帝国与传播. 何道宽,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40] 库尔德利. 媒介, 社会与世界: 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 何道宽,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The Subjective Practice and Power Negotiation of Digital Hoar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lgorithm Domestication

Yan Daocheng, Peng Tianyua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digital age, digital hoarding has evolved from an individual behavior into a typical media practice. However, traditional research has mostly been confined to the binary framework of “pathological narrative” or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failing to fully reveal the complex mechanisms behind it. This study adopts a qualitative method combining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aking *Xiaohongshu, Douyin and Bilibili* as digital fields, focusing on the practical logic and meaning construction of users’ digital hoarding behavior.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digital hoarding is not a passive storage behavior, but rather a communication practice in which users actively construct subjectivity in an algorithmic environment, specifically manifested in three dimensions: instrumental, emotional, and symbolic. Meanwhile, this behavior is also a dynamic power negotiation process among “user-algorithm-platform”. However, the expression of users’ subjectivity is often accompanied by the implicit transfer of power, and the resistance behavior is also difficult to escape the absorption of technological capitalism, falling into a dual predicament of “empowerment and transfer” and “resistance and absorption”. Behind this lies the implicit reproduction of algorithmic power through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data and the hegemony of rules.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dialectical domestication model of “three-dimensional interaction + dual-cycle game”, and proposes to build a dual framework that combines communication empowerment and governance adaptation,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 technology - capital” in the digital age.

Key words: digital hoarding; algorithm domestication; subjectivity practice; power negotiation

■ 收稿日期: 2025-09-20

■ 作者单位: 燕道成,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1

彭天媛,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 责任编辑: 刘金波